

XINWEN
CAIFANG
YUXIEZUO



新闻采访与写作

封面设计：邱承德

新闻采访与写作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0 字数220千字

1981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34,300册

书号：3132·016

定价： 0.88元

写 在 前 面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选编。所收文章，多是1979、1980年，这个专业聘请的一部分老新闻工作者、教授和作家给研究生讲课的记录，少数选自书刊杂志。内容涉及新闻采访、新闻理论、报告文学和写作。这是一本新闻工作者经验和心得的汇集。

新闻学著作匮乏，应该多出一些新闻书籍，这个呼声已经越来越强烈了。我们编辑这个集子，既是为了解决教学之需，也希望能为新闻战线的同志和新闻爱好者们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并且向广大读者普及新闻学知识。从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把我们的新闻事业搞得更加兴旺。

限于篇幅，收入本书的文章大都有所删节，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保持原貌，编者未加改动。有一些文章还带有较强的口语报告色彩，不及作很多的加工修饰。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编选工作会有不妥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1980年7月5日

藏书专用章

目 录

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	穆 青	(1)
有关新闻写作二三事	田 流	(21)
我爱新闻工作	萧 乾	(43)
奔腾在火热的战斗生活里	阎 吾	(52)
战斗在生活的激流里	纪希晨	(63)
谈谈记者的基本功	顾 行	(113)
新闻工作者应当是一名战士	顾 雷	(130)
记者工作漫谈	柏 生	(147)
两篇通讯的采写经过	陆拂为	(161)

* * *

报告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必须严守真实的

党性原则	黄 钢	(173)
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问题	理 由	(218)

* * *

新闻工作与文学修养	程光锐	(267)
语言美的探索	白 夜	(278)
散文漫话	姜德明	(290)
谈谈国际随笔的写作	司马达	(301)

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

穆 青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发表以后，许多读者和新闻界的朋友来信，热情地给以鼓励，同时希望我们联系过去写焦裕禄、吴吉昌等先进人物的情况，谈谈采写这类人物通讯的体会。体会不能说没有，但是想来想去总觉得大多是些老生常谈，没有多少新意。况且这几篇人物通讯都是集体写的，我个人的体会更有限。既然大家出了这样一个题目，那就姑妄言之，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一、人物通讯要表现时代精神

人物通讯，是无产阶级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新闻中，大量报道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先进人物的活动，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责，也是无产阶级新闻区别于资产阶级新闻的特征之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必须“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始终不渝地去体察和反映人民群众那种不可遏止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极其忠实地报道他们听到的人民呼声”（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全国解放以

后，我国人民群众（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是他们的代表）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伟大创造作用，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风貌，就是他们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那种历史主动性的最本质的表现。这种精神和思想，应该成为人物通讯的基本的主题。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类人物通讯，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以下简称《榜样》、《嘱托》、《报道》），以及兄弟报刊采写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比起过去战争年代的人物通讯，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要区别，就是这些人物通讯更深入地揭示了先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更鲜明更深刻地体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加上适当运用了文学的和政论的表现手法，因此它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成为我们无产阶级新闻武器库中一种有着特殊战斗作用的武器。

我们今天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极大地鼓舞着人民群众。他们的优秀品质，集中了我们共产党人的特质，熔铸了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脊梁。人物通讯如果能广采博记这些英雄人物，成为我们时代的宝贵记录和鼓舞人民前进的号角，我们的新闻报道就将激励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更伟大的业绩，在新的长征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试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干部象焦裕禄，更多的工人象王铁人，更多的农民象吴吉昌、“老坚决”（指《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的主人公潘从正——编者注），更多的战士象雷锋、王杰，更多的医生象李月华，那么，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不就能大大加快了吗？！

人物通讯的这种作用，要求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写成一部“好人好事录”。因此，能否高瞻远瞩地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且从这个高度来表现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和思想风貌，就成为决定人物通讯成败和优劣的关键。

根据我们的粗浅体会，提炼和确定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十分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针对性”的问题，也就是要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考察同当前斗争关系最密切、群众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课题是什么；另一方面要考察人物本身具有哪些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精神。离开人物本身的客观事实，主观主义地“拔高”，硬要“提炼”出一个什么“主题”是错误的；同样，离开现实斗争中的重大课题，罗列材料，就事论事，也不可能反映出重大的主题。

以《嘱托》的主人公吴吉昌来说，这个人物给我们提供的思想启示是多方面的。诸如：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都要有全心全意的精神；无论进行什么样的科学实验，都要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等等。以“老坚决”来说，他那种对树苗的热爱，对种树的“入迷劲”；干什么工作，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好的“坚决劲”，等等。宣传这些思想都能指导工作，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事实上，《嘱托》的前身，就是一篇写吴吉昌坚持运用辩证法种棉花的通讯。但是，如果《嘱托》和《报道》最后确定的主题只停留在上述的范围，那就会显得一般化。因为它没有能够回答现实斗争中的重大课题，也没有表现出吴吉昌、“老坚决”身上最有时代特征的可贵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

一场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这场斗争决定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迫切需要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团结一致向前进。而吴吉昌、“老坚决”身上表现出来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正可以回答这些重大课题，鼓舞人民继续奋勇前进。

以吴吉昌来说，他所体现的，就是按照周总理的嘱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彻底革命精神。以“老坚决”来说，就是不顾人为的“风口”的袭扰，在政治动荡的年月里，坚韧不拔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毅力。而吴吉昌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那种“啥也别想挡住俺”的精神，“老坚决”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渴望，正是亿万人民群众共同的意志和心愿。也就是在这些思想的启示下，我们找到了确定《嘱托》和《报道》的主题思想的主要依据。

主题确定以后，要着力地选择典型材料来充分地深刻地表现它。凡是有利于突出主题的材料，都要有效地加以利用；一切游离于主题（即使游离得不远）的材料，不管它多么生动，则要毫不可惜地予以割爱。例如，为了突出主题，我们在《嘱托》中着力描绘了“文化大革命”中吴吉昌的遭遇，和他当时所处的典型环境，再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真实情况，通讯发表后，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但是绝大多数读者认为，这样写是真实的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写，才能突出地反映吴吉昌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贵的革命精神，体现出时代意义，说出了人民想说而未说出的话。又如，为了避免次要的材料削弱主题，我们在《报道》的写作中，几经斟酌，最后舍弃了不少生动的材料。有这样一些动人的事例：“老

“坚决”经常带着那条小狗巡视苗圃，发现谁拔了几棵苗，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有一次，他儿子也拔了几棵回家去栽，他追到家里狠狠地把儿子批了一顿，并且亲自到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赔了苗钱……。“老坚决”的苗圃是全村孩子们最爱去玩的地方，有时免不了踩坏几棵。“老坚决”当然心疼了。一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追到孩子们的家里，要他们的父母好好管教孩子，不许再糟践幼苗。这一下子可惹急了那些顽皮的孩子，他们甚至在苗圃垒了个“坟”，插上个“幡”，写上“老坚决之墓”，来“咒”他……。这些材料确实是生动的，也很能反映“老坚决”的思想和性格。但是我们认识到，给“老坚决”的造林事业带来深重灾害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那人为的狂风暴雨。《报道》的主题就是“老坚决”的那句话：“今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如果把上述这些生动的但比较来说是次要的材料全写进去，就会冲淡和削弱主题，因此我们坚决割爱了。又如，在《榜样》的几次初稿中，都有一段兰考人民到焦裕禄墓前哭坟的描写，就其感染力来说，可以催人泪下。但是仔细推敲，这一段给读者的，不过是凄切的一哭。《榜样》的主题既然是“困难面前逞英雄”，这段哭坟的材料就无助于加强主题。于是，我们简化了哭坟的描写，改用大段铿锵的排句，歌颂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在兰考大地生根开花的壮丽景象，这样，就比原来的结尾要有力得多。

二、人物通讯的力量在于真实

有的研究者把这类人物通讯列为报告文学。我们认为，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品种的人物通讯，同文学是有区别的。

文学可以而且必须虚构，而人物通讯却不能有任何虚构，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是真实的。新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是两种意义上的真实。文学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它的人物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加以概括、集中而塑造出来的，它所写的人物是没有通讯地址的。阿Q就是阿Q，决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个实实在在的人。阿Q所在的未庄，是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虚构的地址。人物通讯就不然了。它所写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他们是有通讯地址的——焦裕禄是兰考的县委书记，吴吉昌在山西闻喜县东镇公社涑阳大队。如果他们还活着——象吴吉昌、“老坚决”，读者可以和他们通信，甚至可以亲自去访问他们，看看他们的业绩，听听他们讲话。

用事实讲话，这是新闻报道的原则。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人物通讯，也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个原则。一篇优秀的人物通讯，其所以具有强烈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量，重要原因之一，也正由于它写的是真人真事，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榜样。雷锋的事迹发表以后，毛主席、周总理发出号召，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运动，造就了许多活雷锋。《榜样》发表后，不少地方的党组织作出决议，号召党员向焦裕禄学习……。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人物通讯巨大的榜样作用。

正因为如此，人物通讯绝不可有任何虚构。一篇人物通讯，哪怕只有很微小的一点虚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假，必然会对整个通讯产生怀疑。这将是一种可怕的“信任危机”，读者看待党报，看待我们的新闻报道，就会象《红楼梦》中那副对联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那样，一概不相信了。这样一来，我们的新闻报道，“有”也等于“无”，甚至比“无”还要坏。林彪、“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弄虚作假，伪造事实，那灾难大家都看到过了，至今我们还身受其害。

那么，不虚构能不能完美地表现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质，能不能写得深刻感人？回答是肯定的。生活本身是丰富的，实际生活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语言、思想感情，都是非常感人的。这决不是记者坐在斗室里靠“灵感”冥思苦索能够杜撰得出的。如《榜样》中焦裕禄和县委“一班人”风雪夜前往车站那感人的场面，《嘱托》里群众把用鲜鱼配制的药悄悄塞进吴吉昌的篱笆根下那令人落泪的细节，都不是记者能够想象出来的。问题不在于真人真事能不能深刻地表现人物，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千方百计地深入发掘，敏感地捕捉住那些最能体现人物本质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感人的细节。不能虚构而又要把通讯写得深刻、感人，这确实是很困难的，但记者的职责和本领恰恰就在这里，它要求我们必须为此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

《嘱托》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吴吉昌被勒令每天去村外割草的那些日子里，一天，他看到北街大队的棉花正在疯长，他很想提醒社员们，但想到自己的处境，又犹豫了。他内心的斗争非常激烈。直到第三天，当社员们走出棉田，围在一棵大树下面休息时，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凑了过去。人们用同情和关切的眼光看着他，沉默着。半晌，吴吉昌好象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棉苗长得不错啊。”队长立刻回答说：“就是挂桃少。”老汉说：“那是因为后期管理没跟上。”这时候，一位中年妇女冲口说：“吴劳模，你给指点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

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回答：“老大哥，俺们心中有数……”

这个细节，揭露了林彪、“四人帮”迫害劳动模范、破坏生产的反动嘴脸，更表现出吴吉昌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深沉感情，给通讯增加了感人的力量。但是这些细节我们开始采访时并没有掌握。我们只知道他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在被迫割草的时候，还在别的大队实验种棉花。当然，就是这些，也可以看出吴吉昌的精神之感人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向吴吉昌和他的老伴询问，又“跟踪追击”到北街大队深入采访，这样，那些感人的细节才一个个地显露出来。“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老大哥，俺们心中有数……”，这对话，就是北街大队的社员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字未改，写进了稿子。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浅尝辄止，不深入采访，满足于一般的了解，就不能获得这种感人的细节。

在采访和调查研究时，不能采取合口味的就愿听愿记，不合口味的就不屑一顾、不理不问的态度。应取的态度是：充分占有材料，然后分析选择。在《报道》中，我们写了一个细节：“老坚决”在他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时，变得暴躁不安，甚至打了老伴一拳。我们在追索老夫妇俩这场争吵时，陪同采访的同志感到很奇怪：这样的材料也能写吗，写英雄人物还能写他打老婆？当时，我们想的是：这个细节是反映“老坚决”思想矛盾尖锐化的一个素材，应该了解，把它记下来。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它反映了“老坚决”在当时处境下的十分痛苦的心情，因此，最后决定写进了稿子。

当记者掌握了大量的细节之后，还必须善于构思，巧于

运用和安排这些细节，突出它的思想意义和感人的力量。例如，吴吉昌的腿被打断了，胳膊被拧残废了，仍然被勒令在村道上扫街。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力控诉。但是孤立地写这件事，就不如这样写更有力：交代出背景——那村道两旁的白杨树就是他前几年领回的奖品！这样一交代，白杨树就成了无言无语却悲愤满腔的历史见证了：“白杨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为这不平在愤怒？！”白杨树是吴吉昌为全村人赢得的荣誉树。这个细节本来是不难从采访中获得的，但是，把它和吴吉昌被迫扫街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这就增加了它的感染力，使读者对吴吉昌的被迫害，更感到无比愤慨！

类似这样的事例说明，获得细节，处理好细节，这是记者的思想水平、新闻敏感、采访经验、写作技巧等能力的综合反映。离开这些基本功，离开这些基本素质的全面锻炼和提高，就谈不上提高捕捉细节的能力。

三、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人物通讯要写得深刻，必须在充分展开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区别新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前提下，恩格斯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物通讯。我们认为，人物通讯所要再现的典型环境，主要是人物所处的特定时代的重大矛盾冲突。焦裕禄“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革命性格，就是在十分尖锐的斗争中显示出来的。《榜样》写了焦裕禄在兰考县一年半所经历的三个方

面的斗争：一是同严重的自然灾害——内涝、风沙、盐碱作斗争，二是同人——干部中在困难面前灰心丧气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三是同他自己的病痛作斗争。吴吉昌为了实现周总理的嘱托，“啥也别想挡住俺”的不屈形象，也只是当林彪、“四人帮”的灾难落在他头上的时候，才展现得那样鲜明。同样，“老坚决”那“缴网劳蛛”的形象，也是在他苦心经营防护林的反复斗争中，才表现得那样高大。

那么，应该具体展开什么样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该写到什么程度？这是没有成规可循的。但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战士，有一个重要原则是应该坚持的，那就是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要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即使这种矛盾一时还是人们噤若寒蝉、莫敢问津的“禁区”，也要敢于闯！我们不能绕开矛盾走，更不能违心地去掩盖和粉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我们应该通过新闻报道，积极地促进矛盾的解决，推动历史前进。无产阶级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它的党性原则是一致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向党的利益负责和向人民的利益负责是一致的。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党性的集中表现。

就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在《榜样》一文中，我们如实地描写了三年困难期间，兰考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在《嘱托》中，我们写了吴吉昌遭受的一次次毒打、屈辱和责难，甚至有病都不让他外出就医。就是这样，那些人还是向他勒索“专政费”，逼得他的老伴不得不把衣物都变卖了。我们还写了他帮助邻队种棉花创造了丰产新纪录，却被攻击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创造了双秆棉，却被污蔑为“唯生产力论

的活标本”……。总之，我们写了吴吉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真实地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和反复，动荡和混乱。在《报道》中我们写了“老坚决”侍弄的防风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起两落，还追溯到刮共产风的一场灾难。

我们这样写，是因为这些矛盾冲突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回避这些矛盾，就不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必然会导致英雄人物形象的一般化、概念化，不能深刻地反映人物思想的时代特征。只有真实地具体地再现特定的历史环境，才能做到不仅写出人物的历史命运，还有助于刻画人物的性格。正象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而且应当是这个样子。”从新闻通讯的特点来说，它越能具体地再现历史的真实，也就越能发挥自己作为历史记录的作用。

如何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要写出人物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写矛盾冲突，无非是三种：人和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物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仅仅写到前两种矛盾，还不能最深刻地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要真正写出活生生的人，必须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因为这是客观的矛盾冲突在人物主观上的反映。这种矛盾既能反映出客观矛盾的普遍性，又能反映出人物思想、性格等方面的矛盾的特殊性。因此，努力发掘并且生动地描绘出这种矛盾，有助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当然，写人物思想上的矛盾冲突，也必须通过事实，即故事、情节、对话等等来表现，而不能由记者“合理想象”或主观臆造出一套东西来。这后一种做法，没有事实作基础，只能产生相反的宣传效果。前面说的“老坚决”打了老伴一

拳，就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反映内心冲突的一例。在《嘱托》中，也有好几处写了吴吉昌这种内心的冲突。如夜深人静，他蹒跚徘徊，自言自语：“总理啊，您知道不知道，他们不让我完成您交给的任务！”他在邻村大队的棉花地里徘徊了三天，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忍不住凑了上去……。这些，都是写他的内心冲突。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目睹过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特别是对他们残酷迫害干部、劳模有过切身感受的人，都会同吴吉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深刻理解吴吉昌当时那种“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的心情是多么富于典型意义！这样来表现吴吉昌，就写出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唤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感情，使通讯发挥了更强烈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量。在通讯中，我们还特别写了这么一段：吴吉昌甚至想过要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不是有点逃避矛盾的消极味道吗？而且，当时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波及全国，想找一个“世外桃源”，不也是天真的幻想吗？但是，这正是反映出当时吴吉昌无可奈何，内心矛盾已经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我们又把他这次想离家出走同他爷爷当年的逃荒相对比——两个社会的两种出走，就更深刻地反映了吴吉昌当时的处境和他的倔强精神。

四、调动多种手段为表现人物服务

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对于主题思想能否展开得深刻，人物形象能否刻画得生动感人，关系很大。因此，必须下功夫加以研究。这涉及到写作技巧的一系列问题，现在仅谈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篇好的人物通讯，往往会起到人物的某一段传记，时

代的某种纪录的作用，甚至会起到某种时评或政论的作用。人物通讯的内容要求它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多样化。我们认为，在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一切可用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文学的、政论的乃至电影艺术的某些表现手法，都可以适当地吸收到人物通讯的写作中来，为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服务。人物通讯中可以有记者的抒情、议论和评述。甚至类似《史记》中“太史公曰”那样的人物总评的手法，也不是不可以借鉴的。

我们在采写人物通讯的过程中，比较喜欢运用质朴的白描手法。这种表现手法有时也借助语言的音响和色彩来加强效果，但主要依靠事实，形象，思想来打动读者。它的特点是能豪华落尽见真谛，从平凡中见深刻，在沉静中见热烈；尽量做到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运用白描手法的难度很大，需要较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更需要反复锤炼和推敲。当作品一经完成后，读者从中看到的只是真实的生活本身，看不到作者斧凿的痕迹。当然，我们已经发表的几篇人物通讯，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这始终是我们力求达到的目标。

多作形象描写，力避冗长沉闷的叙述，以描写为主，把描写和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物通讯应该着力描摹刻画人物的形象。但是这不应是一堆事件的罗列和堆砌。从新闻的特点出发，一般地讲，应该要求人物尽快地出场，从一开始就应该以他自己的行动、语言感染读者。《报道》的初稿，第一小节有一长段叙述，介绍“老坚决”得名的由来：他在土改中如何坚决，反霸中如何用一条绳子捆上了十二个土匪……这些叙述象流水账一样，